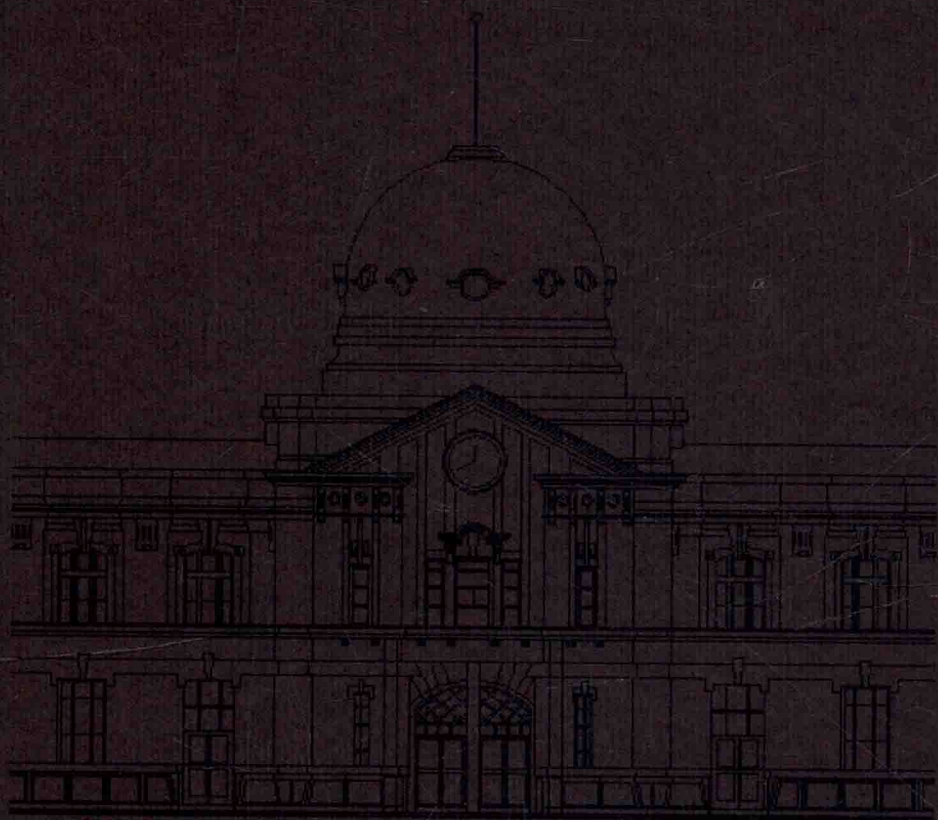


沈阳近代建筑史

SHENYANG JINDAI JIANZHUSHI

陈伯超 刘思铎 沈欣荣 哈 静 等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沈阳近代建筑史

陈伯超 刘思铎 沈欣荣 哈静 等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阳近代建筑史 / 陈伯超等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112-18540-5

I. ①沈… II. ①陈… III. ①建筑史—沈阳市—近代 IV. ①TU-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6423号

本书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沈阳近代建筑史研究”(项目号: 51178273)的主体成果, 其内容也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资助项目“沈阳近代建筑文化研究”(项目号: L14AZS003)提供了多方面的成果支持。本书打破了按照“进化论”模式通过时间断代探寻发展规律的方法, 而是根据近代沈阳城市和建筑的具体情况, 采用以“沈阳城市板块”为单元的空间界域分析法, 分别揭示和分析各城市板块的形成过程与原因、规划布局、建筑特点及其发展规律, 并分别以建筑类型、建筑技术、建筑师与建筑管理、本土化与标志性特征为专题, 阐释了它们的发展过程和地域性特征。为了解和研究沈阳近代城市与建筑情况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和令人信服的分析与结论, 也为当代沈阳城市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有价值的参考。

责任编辑: 李东禧 唐旭 杨晓

责任校对: 李美娜 关健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要撰稿人: 刘思铎 李勇 沈欣荣 陈伯超 郝鸥 哈静 徐帆 谢占宇

参与撰稿者: 王肖宇 马小童 包慕萍 兰洋 吴鹏 何颖娴 张勇 张艳锋

陈旭东 胡艳宁 柏传友 原砚龙 高笑赢 童彤

沈阳近代建筑史

陈伯超 刘思铎 沈欣荣 哈静 等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锋尚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16 印张: 19½ 字数: 482千字

2016年1月第一版 201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78.00元

ISBN 978-7-112-18540-5

(2777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前言

中国近代建筑历史 发展过程的特殊性

中国建筑的近代化不能以“现代化的转型”一言蔽之，它不同于西方建筑的近代化过程。它既包括中西古典建筑向现代化的转型，也包括对西洋古典建筑的引进以及外来建筑在被引进过程中的本土化。

中国建筑的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中国近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外国列强以洋枪洋炮打乱了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使这一段历史不能再继续按部就班地遵循它原本的发展轨道，而任由外国列强摆布。西洋文化、西洋技术伴随着西洋炮舰堂而皇之地破门而入，打破了它几千年的独统地位。反客为主的西洋文化从上层建筑到物质基础的不同层面上，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时尚。

处于这个时期、这样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建筑，不能例外地脱离它长期一贯且独树一帜的建筑发展路径，进入到了洋化轨道之中，西洋化成为中国和沈阳近代建筑发展的时代大潮。

中国建筑的近代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西洋建筑的进入及其本土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排除对西洋古典建筑和新古典建筑的引进和接纳；二是本土建筑（主要指中国传统建筑）的变异和继续发展；三是建筑的现代化转型。在内容上，它比欧洲建筑的近代化过程主要体现为现代化转型要更加丰富。欧洲进入近代的标志和前提条件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大机器生产的实现。由此形成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以及二战后对建筑的大量需求，使得建筑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走上了现代化（英语中“近代化”与“现代化”并无严格的区别）之路。用“建筑的现代转型”概括这一阶段欧洲建筑发展的特点虽然不是非常准确，但其内容不失完整。然而，若认为中国建筑的近代化类同于欧洲同一时期的发展过程，将会忽略如前所述的前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其研究结果将会有所缺失和偏颇。

1. 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达尔文“进化论”的横空出世，一举冲破了传统理念的束缚，让人们以科学的眼光认识到世间生物发展的真实规律，更引发了社会学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和探究。于是，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得到了确认：被植入了生物进化论基因的“历史进化论”体系，开始成为世界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主流。

康有为指出，“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在进步之途，从前曾经‘废席地而用几桌，废豆俎而用盘碟’；后来则‘以楼代屋，以电代火，以机器代人力’。”^①梁启超评论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康有为）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盛。”^②梁启超认为，进化有一定的次序和固定的阶段，这种次序不能打乱或超越。“何为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秩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也。”^③孙中山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不断升腾的过程，且后一个阶段较前一个阶段在价值上为优。”^④

先哲的认识正确地反映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类同于生物的进化过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前行，不断进化。因此，历史研究的方法，必然要体现和符合历史进化论的规律。正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给历史立下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界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于是，历史（也包括建筑历史）研究的方法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演进式研究：按

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根据事物发展阶段进行断代，展示不同阶段事物发展的状态、水平、特征、缘由和关联，进而找出并归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另一类是专题演进式研究。就建筑历史研究而言，可以将建筑发展的过程分解为不同层面，从不同视角分别对它们的发展过程进行解析，比如建筑空间演进史、建筑技术史、建筑营造史……当然，无论哪种研究方法，都是依托于历史进化论的基本理念。

以欧洲为代表的世界建筑的近代化进程，不可豁免地体现着进化式发展的规律。它以技术、材料、社会生活与观念的革命性转变与发展为基础，完成了西洋古典建筑的现代化转型。这一过程体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由雏形到发展到兴盛再到成熟、由尝试到推广再到规范化……的特点，属于明显的进化式演进。

2. 中国近代建筑史的非进化式发展历程

中国近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外国列强的干涉力完全盖过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冲出了自身发展规律的控制。中国建筑的近代化体现为西洋建筑的传入及其植地过程中的本土化结果，它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几千年的独统地位，将这块曾经创造了建筑奇迹的东方建筑圣坛让与西洋建筑。反客为主的西洋建筑成了中国近代建筑的主角。在这种外来政治、经济与文化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近代建筑呈现为非线型的和非进化式的发展势态，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与现代建筑的发展情况，也不同于欧洲近代建筑的发展路径。

西洋建筑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已踏上了近代化的进程，并经历了反叛、提高、完善和成熟的阶段，最终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然而，中国建筑的近代化恰如在超市买东西：在已经经历了发展全过程并展示着不同发展阶段建筑成果的欧洲

① 见参考文献1。

② 见参考文献1。

③ 见参考文献2。

④ 见参考文献3，第153页。

“建筑市场上”，挑选合意的“商品”——“购物者”也许并不关心产品生产的先后次序，是第几代、第几版，而更在乎自己的口味。这种在“西洋近代建筑超市”中，经外国人的引介或中国人的选择拿过来的舶来品，再经过为适应当地条件的本土化加工过程，恰恰是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切实写照。

建筑的引进并不需要遵循当初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先后顺序，而是根据具体的需求和中国的实际条件进行选择的结果。前期引进的建筑比后来引进的建筑更为先进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引进的顺序完全可能与发展顺序形成“倒插笔”式的结果。

因此，面对这种历史的特殊性，面对这种“选择-加工”式的发展特征，用历史研究中普遍采用的进化论方法来探索中国和沈阳近代建筑的发展规律是不恰当的，其结论也必将有所偏颇。这就需要我们打破常规，而采取一种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方法。

3. 建筑近代化“推手”——设计师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建筑近代化的过程中，设计师作为西洋建筑引进过程中的直接推手，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包括对建筑形态的遴选，对建筑空间、功能内容、建筑技术、结构与设备技术、建筑材料、建筑施工等具体问题的解决，他们是建筑西洋化的诠释者与导入人，也是令西洋建筑在诸多条件与其原生地皆存差异的情况下落地中国的主要运作者与实现人。因此，出自不同设计师之手的西洋风建筑，大都体现出他们的个人癖好、见解、审美观、技术专长、手法特点和设计品位。从中国近代建筑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设计师的作用往往比其他时期更为直接与明显。

按照设计师的国别大致分为两大类：西洋人和东方人。

来自西洋国家的设计师在中国所提交的作品大多具有这样的共性特点：

(1) 中国建筑的近代化主要体现为建筑西洋化的过程，而他们对西洋建筑了解透彻，娴熟掌握了西洋建筑的设计要领与手法。他们的作品在较大程度上属于对西洋建筑文化直接搬用和移植的范畴，只是当建筑材料和建造技术因地域条件无法满足时，局部地采取以地方性的材料和技术对原型做法的替代办法。在西洋人眼中，这类建筑似乎更为“正统”和“地道”。

(2) 来自不同国家的设计师的作品也有细微差别，在许多人眼中更真切地看到的是它们与传统中式建筑的巨大反差，而它们之间的差别往往被忽视，然而，对于中国近代建筑的专业研究来说，这却是不容忽略的部分。

由于来自东方国家的设计师是在学习别人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加入他们自己的理解和某些习惯做法，因此，他们的设计作品不可避免地会与原生地的西洋建筑有所区别并反映出设计师个人或来自国家的文化印迹，其结果就常常被人们批评为“不伦不类”和“不地道”，其实，这种对西洋建筑的改良，恰恰孕育了一种再创造因素。

根据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来自东方国家的设计师又可以分为日本设计师、中国学院派设计师和非学院派设计师。

(1) 日本的明治维新给许多日本青年带来了赴欧留学的机会，其中不乏一批接受西方建筑教育和西洋文化洗礼的青年建筑师。这批喝洋墨水成长起来的设计师回到日本后，却面临日本国内十分有限的建筑市场，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受。恰恰是日本在中国的利益索求成就了这些青年建筑师们的深造之旅。随着日本的侵华步伐，妄图把中国广袤的疆域变成日本国土的延展，在日本建筑师的眼前呈现出一片得以施展专业才华的广阔空间与天地。一时间，中国大地，尤其是

由日本势力独霸的“南满洲”，成为日本海归建筑师们的试验场。他们留洋的学习成果在这里得到展示；他们从欧洲学来的建筑理论和设计手段，在这里转化为建筑实践和建设成果；他们对西洋建筑的认识，在这里得到了升华。

他们的设计作品流淌着西洋建筑与东方文化相互融合的“血脉”，呈现为有别于出自“纯”西洋建筑师之手的“西洋式建筑风格”。

(2) 近代也正是中国第一代留洋建筑师初露头角的时期。他们努力学习、解读和把握西洋建筑文化和建筑技术之真谛，贯彻着由海外导入的建筑设计理念。也正是这种理念所倡导的“紧密结合当地当时条件进行建筑设计”的思想以及这一代设计师群体所具备的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和中国人普遍的价值观，使得他们一直探索着将西洋建筑与中国实况相互结合之路。这种追求展示在他们从初始到后期的一系列作品的发展与进化过程之中。他们是中国近代学院派建筑师的代表。专业素养使得他们的设计作品体现着西洋建筑的经典与精华，追逐着西洋建筑发展的潮流。他们在外来势力当道的中国近代建筑舞台上，毫不逊色地占据着一席之地。

(3) 论数量，由中国设计师设计的作品更多地出自非学院派设计师之手。当时，能够出国进行建筑学专业学习并回国工作的仅是凤毛麟角。国内的建筑学专业又刚刚起步，每年培养的毕业生相对于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技术人员数量也是微不足道的。也有少数留洋归来从事建筑设计且颇有成就者，他们在国外所学习的专业却并非建筑学，而是凭着他们的在国外对西洋建筑的认真观察，凭着他们对建筑的挚爱和过人的聪敏，成了中国近代建筑设计队伍中的重要力量（如原留学意大利学水利后改做建筑设计的天津的沈理源，原在美国学矿冶回国兼做建筑师的沈阳的穆继多等）。大多数从事建筑设计的设计师并没有受过建筑学专业高等教育，而是出自土木、测绘等专

业的专科学校，或是由原建筑绘图员转做设计工作，或是在工程实践中摸索成长起来的设计师。

这类“非学院派设计师”对西洋建筑中严谨的秩序、规制并不了解，也无从深究，他们的目光往往聚焦于对西洋建筑样式中最华丽、热烈、抓人眼球的部位与片段的模仿，将这些符号拼合在一起，具有十分典型的“折衷主义”特征。

也许，从西洋建筑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作品并非经典，但绝对不失西洋风范，反而其西洋建筑特色往往十分浓郁，且以繁杂的细部令建筑更具装饰性。为追求洋风样式，不但会毫不犹豫地略掉学院派的种种清规戒律，甚至不顾建筑形式与功能的一致性、内部空间与外形的一致性、建筑形态与结构关系的一致性……这种不按规矩出牌的成果，往往更接近社会审美情趣，更符合大众口味，成为近代建筑艺术中的“波普”成分。

设计师在近代所担当的重要角色及其作用，是中国建筑在不同地域形成风格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某一类设计师的作品相对集中于某一地区时，则会成为构成不同的地域性建筑特色的重要原因，如上海的近代建筑大多由西洋设计师所为，大连聚集了大量日本设计师的作品，而广东、福建较多地汇聚着中国本土设计师的设计成果。因此，这些地区的洋风建筑又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差异和各自的风格。

沈阳的这种现象也十分典型，主要体现在呈不同“板块结构”的各个城市区域之间。

“满铁附属地城市板块”作为日本帝国侵华的地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洋人都受到严格排斥，那里的建筑完全是按照日本人的需求和口味由日本建筑师引进与设计的，其作品大多呈现为具有东洋特点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商埠地城市板块”则是多元势力的地盘，由欧美设计师和使用者按照他们的习惯与需求直接从本国引进的建筑类型与技术在该地界之内开花结果，更接近于欧洲本土的味道，不乏甚是“地道”的欧式经典之作；

位于“老城区城市板块”之内的洋风建筑大多出自中国非学院派建筑师之手，是以中国人眼中的“欧式标准”进行设计与建造的，“洋门脸”、“中华巴洛克”、繁琐装饰类建筑居多，折衷主义味道甚浓；而于20世纪40年代突击建成的铁西工业区所体现出来的设计理念，则源自日本建筑师对“现代主义”思想的接纳与应用，从规划到单体建筑设计都是纯粹功能主义理念与现代技术的赤裸展示。因此，同处沈阳城内不同板块之中的建筑，虽然都源自欧美，都可以归结为西洋样式，但却呈现出迥异的建筑风范。这是由于建筑引入人的眼光与设计手法的区别以及使用人的需求与价值观的不同所致。

这种地域性的差异并非仅仅表现在建筑样式方面，也体现在建筑材料与技术、建筑的发展进程等各个方面。沦陷前的近代沈阳，以奉系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和以日本为主体的外来势力势均力

敌，占据各自的板块疆域，在政治、经济和行政管理方面都有其各自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互不相让又互不交往，故而导致了各城市板块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封闭性和相对闭锁。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文化与技术交流受到约束与限制，更加剧了由不同的设计师所带来的地域性差异。比如20世纪初即由日本设计师在满铁附属地应用的红砖、混凝土、三角形屋架、框架结构等，甚至几十年后在老城区还未得到应用和推广……不同城市板块之间的建筑存在着鲜明的区别和发展顺序与跨度的差异。

所以，若笼统地将近代建筑作为一个固化的整体，去研究它的发展过程和特点，势必存在许多无法厘清的问题与矛盾，也难于找出它真正的发展规律。这也正是对沈阳近代建筑研究采取以城市板块为单元，而非断代分期、按不同发展阶段进行研究的原因之一。

目录

CONTENTS

前言 中国近代建筑历史发展过程的特殊性

1. 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2. 中国近代建筑史的非进化式发展历程
3. 建筑近代化“推手”——设计师的重要作用

01 沈阳城市与建筑 近代化的背景

第一节 近代之前的沈阳城.....	1
一、初建沈阳古城.....	2
二、封建都城的建设与发展.....	3
第二节 沈阳城市与建筑近代化的基础与条件.....	7
一、政治环境.....	7
二、经济准备.....	10
三、沈阳城市与建筑近代化的三大影响因素.....	13

02 近代沈阳的 城市板块

第一节 老城区——西洋风最难攻克的传统堡垒.....	20
一、城市构架的恪守与建筑的转型.....	20
二、西洋文化与市井文化的碰撞.....	32
三、从张氏帅府看沈阳近代建筑的演进.....	37
第二节 满铁附属地——东洋人导入西洋风的试验田.....	40
一、从“铁路用地”到“满铁附属地”.....	40

二、市区规划的理念与设计	42
三、城市空间与建筑节点	47
第三节 商埠地——多元建筑文化的共栖地	54
一、由政治势力的多元导致的文化现象的多元	55
二、商埠地的城市空间结构	56
三、商埠地建筑	61
第四节 大东—西北工业区——民族工业催生的新城区	68
一、民族工业与新城区建设	68
二、由工业组团拼合而成的城市板块	74
第五节 铁西工业区——殖民工业与现代主义的产物	75
一、沈阳近代的日本工业	75
二、奉天都邑计划与铁西工业区建设	78
三、基于现代主义的铁西工业区规划与建设	80

03 沈阳近代建筑类型化的 发展与特点

第一节 沈阳近代教育建筑	83
一、“新教育制度”下延续传统教育模式的学校建筑	84
二、“西学中用”，新型办学模式下的学校建筑	87
三、日本教育模式主导下的学校建筑	90
四、沈阳近代学校建筑特征	91
第二节 沈阳近代金融建筑	98
一、沈阳近代金融建筑的发端	98
二、沈阳近代自办金融建筑的形成	99
三、沈阳近代金融建筑的成熟	101
四、沈阳近代金融建筑的地域性特点	109
第三节 沈阳近代影剧院建筑	114
一、早期的茶楼与戏园	114
二、近代中期发展起来的剧院建筑	116
三、近代末期以电影院发展为标志的影剧院建筑的成熟与发展	118
第四节 沈阳近代住宅建筑	126

一、延续传统的住宅建筑	126
二、西洋古典式住宅建筑	127
三、日式洋风住宅	129
第五节 沈阳近代医疗建筑	131
一、沈阳老城区近代医疗建筑的发展	131
二、满铁附属地及周边医疗建筑的发展	136
第六节 多种类型的公共建筑	142
一、商业建筑	143
二、教堂建筑	145
三、其他公共建筑	155

04 沈阳近代建筑 技术的发展

第一节 力学应用引发的结构体系变革	160
一、三角形木屋架的传入与适应性发展	161
二、承重砖墙的砌筑与特性	173
三、砖混结构的技术处理与应用	179
四、近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在沈阳的发展	183
第二节 新型建筑材料的引入与自主生产	188
一、红砖的引入与推广	188
二、水泥（洋灰）与混凝土的现代应用	194
三、玻璃在近代建筑中的应用	198
四、新型装饰材料的出现与应用	199
第三节 建筑设备的现代化发展	202
一、电与电气设备	203
二、取暖设施	204
三、给水排水设施	207
四、煤气在沈阳的使用和生产	209

05 沈阳近代建筑教育、 建筑师与建筑管理

第一节 沈阳近代建筑教育与东北大学建筑系	211
一、百花齐放的沈阳建筑教育途径	211
二、独树一帜的教育摇篮——东北大学建筑系	218
第二节 沈阳近代建筑师与建筑机构	231
一、夹缝中成长的“多源”本土建筑师	231
二、沈阳近代日本建筑师与建筑设计机构	253
三、沈阳近代西方建筑师	260
第三节 沈阳近代建筑（设计）管理机构的建立与体制的完善	268
一、沈阳近代建筑管理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268
二、沈阳近代建筑业管理机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270
三、沈阳近代建筑行业社团组织的建立及其功能	275

06 沈阳近代建筑的本土化 及其标志性特征

第一节 本土化——中国建筑近代化的本质体现	279
一、中国建筑近代化的本质在于本土化	279
二、近代建筑历史的本质是“发展”而非“搬迁”	280
三、沈阳建筑的本土化在西洋建筑置地过程中的体现	280
四、近代建筑的本土化评价	285
第二节 沈阳建筑近代化的标志性特征	285
一、沈阳近代建筑发展的文化特征	286
二、沈阳近代建筑发展的技术特征	288
参考文献	295
后记	298

01

沈阳城市与建筑 近代化的背景

进入近代之前的沈阳（奉天^①），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占领中原之前的都城和之后的陪都，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厚实的基础。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近代中国进入了一个群雄并起、军阀争势的历史时期。1927年，奉系军阀——“东北王”张作霖在乱世之中逐渐夺得头势，被各地军阀拥举而登上北洋军政府海陆大元帅之高位，成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之前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控者。为了站稳脚跟，也为了外与日本、内与各路军阀相周旋与抗争，他和他的继承者张学良将沈阳作为奉系大本营，大力发展军事、经济、交通以及文化事业，城市建设因此而得到极大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都市之一。

这一时期沈阳的城市空间得到了扩延——在老城区和满铁附属地的基础上又拓展出“商埠地”和“大东—西北工业区”两大城市板块，并完成了对各城市板块的整合过程。建筑与城市设施的近代化进程进入繁荣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沈阳被日本强行占领，沦为殖民地。日本为实现国土扩张和全面侵华的更大野心，将沈阳作为其国土之外的重要落足地和根据地，配合战争需要大力发展工业及与之配套的城市建设，在推进城市与建筑近代化步伐的同时又拓展建设了铁西工业区。

沈阳近代城市空间规模与格局最终完整定型——近代沈阳的五大城市板块建设全部完成，城市规模、城市性质和城市构架最终确定下来。

随着西方建筑技术与建筑文化的进入，城市建设得到了发展——与传统样式迥然不同的西式建筑的出现、具有换代意义的材料更新与技术提升、多种功能建筑类型的裂变式增加……地方传统建筑的垄断局面被彻底打破，西式建筑占领了沈城社会的大舞台。

城市设施实现了近代化——市政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电车、汽车、电信、广播……使得城市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灯、自来水、煤气、供热、电梯被广泛地应用到建筑之中。

第一节 近代之前的沈阳城

1973年在沈阳北陵附近发现的新乐文化遗址表明，早在7200年前，就有原始人类生活在今天的沈阳城区。从7200年前新乐时期的农耕渔猎到

^① 清朝时沈阳叫盛京，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盛京将军辖区为奉天省（今辽宁省），其省会奉天府设于盛京城内，自此，盛京也被称为“奉天”。1928年12月到1931年9月张学良“东北易帜”期间，奉天的名字短期被改为沈阳，1931年东北沦陷之后，日本侵占沈阳，又改为奉天，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奉天才又恢复为沈阳的名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沈阳被编入辽东郡，再到西汉时期沈阳“侯城”的形成，从公元921年辽太祖移民沈州城到1296年元代重建土城沈州并改名为“沈阳路”，从1625年清太祖把都城迁至沈阳并更名沈州为盛京，到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后，盛京陪都地位的确立，沈阳经历了无数次社会形态的演变与更迭。

一、初建沈阳古城

在7200年前的新乐时期就有原始人类在今天的沈阳城区农耕渔猎。^①夏商周时期，东北三省地属幽、营二州，此时沈阳已经出现在营州的版图上。战国时期，沈阳隶属燕国，当时沈阳属燕国的辽东郡。燕在今沈阳地区建立了边哨“侯城”，委派大将秦开统辖该城，古老的边哨侯城成了沈阳首城之始。秦汉时期，沈阳渐进发展，初具规模，但仍沿袭旧称侯城。此时的侯城为夯土方城，南北城墙各设一城门，城外设有护城河。到西汉时，辽东郡中部都尉治的治所，就设立在沈阳。

自东汉末年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辽东，至契丹族建立辽国，统一东北的七百多年里，沈阳经历了多次战乱。魏晋南北朝时，曾被高句丽族割据，他们在沈阳一带设盖牟城。隋唐统一中原后，屡次东征，唐太宗曾督师直取辽东。战争中，各族人民的频繁迁徙又增加了相互间的接触和了解，特别是中原汉族先进技术和文化的不断传入，使沈阳地区的经济与文化有所发展。

辽太祖初年，契丹族人进入辽东，在沈阳地区设立乐郊、灵源两县及岩州，又在侯城地带重修方形土城，设置私城名为“沈州”。此后，耶律阿保机向南扩展势力，越过长城到达华北地区。他在攻占幽蓟（今北京一带）后，于公元921年将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的汉民

强制迁至东平（今辽阳）、沈州（今沈阳），开垦荒地。随着大批汉民的到来，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手工业和建筑业相应地发展起来，与中原的贸易往来也较过去频繁，区域经济趋于活跃。辽太宗时，在沈阳大规模建造城垣，在土城内开辟十字交叉道路，中心设有中心庙，并通达四方城门，这为后来沈阳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1116年，金克沈州后，沿置“沈州”，以节度治之。1193年，随着金的统治中心逐渐南移，沈州由节度州降为刺史州，隶属于东京路。1123年，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在攻占辽西后，又将山海关内外迁、润、来、隰四州居民迁来沈州。金代沈州处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区白城子）至东京辽阳府和上京会宁府至燕京（今北京）这两条交通要道的交汇点，境内设有驿站多处，沈阳在东北境内和关内外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3世纪初，由于元兵南下，沈州连遭兵火，城墙几乎全部化为废墟。元朝统一后，于1266年，在今沈阳市原古城内重建土城，并于1296年擢升为“沈阳路”，归辽阳行省管辖。由于元朝所筑的土城恰在沈水（浑河古称）北岸，故改沈州为沈阳，为沈阳路治所，这是“沈阳”一名最早的记载。元代沈阳路治所仍为夯土围成的方城，辟有永宁、永昌、保安、安定四座城门，城内十字大街通四门，城内和四周的庙宇、塔楼建筑高低错落，格局井然，说明当时沈阳的城市建设已具相当规模。元初平辽东，在此设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受辖于辽阳，这时的沈阳已经成为5000余户的大城了。在元代，沈阳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此时的沈阳已经成为首都大都至辽阳路的交通要冲，成为关内外经济文化联系、商品贸易往来的转运站和集散地，是东北的交通枢纽和边陲的重镇之一。

1371年（明洪武四年）7月，明军攻克沈阳后，为了便于控制和管辖东北地区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于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废沈阳路，建

^① 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编，《沈阳市志·综合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89：397。

立了军事性质的卫所，即沈阳卫。^①卫城南邻沈水，有舟楫之利，东依群山，为习武之所，西行直达山海关，北去与蒙古各族相通，是一个在交通、经济、军事上都十分重要的地方。1388年（明洪武二十一年），为加强军事防务，指挥使闵忠在元城旧址上改建砖城。

新改建的沈阳城以元建城隍庙（中心庙）为中心，城为方形，“方九里三十余步，高二丈五尺。池二重，阔三丈，深八尺，围十里三十步。外阔三丈，深八尺，围十一里有奇。门四：东永宁，南保安，西永昌，北安定。”^②四座城门均设在各面城墙中间，分起城楼，建瓮城，城内设有衙署、仓驿、作坊、店铺、寺庙等。新建的沈阳城面积约为1.69平方公里，几乎是整个辽东镇卫城中规模最大的，甚至超过了西线的义州路城。

城内有呈“十”字形交叉的东西、南北两条大街直通各城门，坐落在两条大街中心交叉点上的城隍庙，屏蔽四方，使每相对城门不能相视，这是我国古代城市建设中常见的一种军事防御手段。街道两侧多有衙署、作坊、店铺，沈阳中卫治所及经历司、镇抚司、备御司等官衙，和军储仓、军器局等都设在城内东南地块。设在城东的教场是训练士兵的场所，设在城西南的草场是供军马所需之地。新建后的沈阳作为军城，其管理机构更加完备，设施更加齐全，军事地位和军事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沈阳中卫城东有抚顺千户所城及会安堡、清河堡、东州堡、马根单堡、散羊峪堡、孤山堡，构成靠近边墙环卫沈阳的东半圈防御阵势；西有静远堡、平虏堡、榆林堡靠近卫城，形成直接护卫阵势；北有蒲河千户所城和十方寺堡靠近边墙，

摆出护边的前哨阵势。^③这样，在东北形成了一个以沈阳为中心的半椭圆形防御态势。

明代大兴屯田，沈阳中卫城的垦田数已经达到了“额田一千三百九十顷四十四亩，额量一万七千六百六十六石一斗，额草十七万九千一百束。”^④耕地的增加，粮食的增多，既可以满足军队的物资补给，也发展了当地的农业经济，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富裕和安定，更促进了沈阳城商贸业的发展。

直接促进沈阳商贸业发展的是沈阳周边地区的马市。沈阳中卫城介于明代辽东三大马市之间，北有沟通海西女真贸易的开原马市，南有沟通朵颜、福余、泰宁三卫蒙古族贸易交往的广宁马市，东有与建州女真贸易交往的抚顺东关马市。地处南北贸易及周边马市贸易幅凑的沈阳，不仅是南北经济交往的必经之路，而且也是三大马市商品生产的中心，马市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沈阳城手工业的发展，同时，沈阳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较大的城市经济规模为各马市贸易提供了较丰富的货源，也为商旅活动提供了方便。

除屯田、马市贸易对沈阳的经济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外，交通的便利也是重要因素。明代沈阳是东北驿站的枢纽，其西南连着京师，正南通往辽阳、金、复、海、盖等地，东南可达朝鲜，东北通往奴儿干都司。除了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线外，水上交通有辽河、浑河可通海口，尤其是浑河水道在明代沈阳经济发展中，曾起着很大的作用。^⑤

二、封建都城的建设与发展

明初，为了保护边境抵抗女真，设立了沈阳

①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 奉天通志·沿革六·统部六·明. 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1188.

②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 奉天通志·建置一·城堡·沈阳县. 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1963.

③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 奉天通志·沿革六·统部六·明. 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1188.

④ 毕恭等. 辽东志·兵食志. 沈阳：辽海出版社，1984：33.

⑤ 张伟，胡玉海. 沈阳三百年史.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20-21.

中卫。1388年（明洪武二十一年），指挥闵忠奉旨于旧址修建城池，开创了沈阳规划建设史上的新纪元。1621年（后金天命六年）2月，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兵水陆并进，直取沈阳城，但是并没有直接在沈阳建都。在以后的作战之中，努尔哈赤逐渐意识到沈阳的重要战略地位。1625年（天命十年）3月，努尔哈赤力排众议，迁都沈阳^①，沈阳一跃成为后金政权的统治中心，继而成为清王朝的发祥地，这为沈阳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此结束了军戍性城池的历史，开创了沈阳为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综合性城市的先河，奠定了今天沈阳的根基。

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至1644年（顺治元年）迁都北京的20年间，后金政权在沈阳不仅创建了皇宫，同时还拓展了以皇城为中心的城池，衙署、坛庙、王府逐一形成，鳞次栉比，开始了沈阳城第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一）清入关前盛京都城的建设

城池在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特别是沈阳城地处平原，无险可恃，只有依赖城池坚固，才能御敌。由于迁都沈阳是在时间非常紧迫的情况下进行的，加上人力、物力的限制，因而努尔哈赤只从军事上着眼，在明中卫城的基础上加固了城池，在原有的城市空间体系中，应急性地建设了天命汗宫、大政殿与十王亭等办公机构，即今天沈阳故宫的东路建筑。

天命汗宫位于沈阳城北门——镇边门内的西南侧城墙根下，为努尔哈赤起居之所。大政殿和十王亭位于天命汗宫之南，中心庙东南处，为努尔哈赤临朝听政和大臣办公及议事之所。其中大政殿坐北朝南居中，“十王亭”分列两侧，成南向外八字形，两列亭子轴线的延长线相交于大政殿

的主轴线，即东路的中轴线上，这不仅是科学地运用几何透视原理，更是满族八旗制度下“君臣合署办事”在宫殿建筑上的反映。在十王亭的南端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奏乐亭。汗宫与大政殿、十王亭建筑群相距一里多，位于城内中轴线上的通天街将其连成一线。城内建筑空间比较开放，整体性也比较强，尚没有明确的等级界限，保留了满族游牧民族的风格。

1626年（天命十一年），皇太极继位后，参照他所能了解的中国王朝都城应具有的元素，并根据当时国力，开始大规模地改建沈阳城，扩建了盛京皇宫、城垣，将盛京城建设成了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

新建的盛京城，作为天子治居之城，比明沈阳中卫城的规模略有扩大。据《奉天通志》记载：“天聪五年，因旧城增拓，其制内外砖石，高三丈五尺，厚一丈八尺，女墙七尺五寸，周围九里三百三十二步。”^②城墙改为砖石，质地上更加坚固。同时，将原城的四门改为八门，新建的盛京城“四面垛口六百五十一，明楼八座，角楼四座，改旧门为八，东向者左曰抚近（大东门），右曰内治（小东门）；南向者，左曰德盛（俗称大南门），右曰天佑（小南门）；西向者，左曰怀远（大西门），右曰外攘（小西门）；北向者，右曰福盛（大北门），左曰地载（小北门）。”^③其内涵颇有上承天佑，下感地载，内修文治，外攘兵患，安抚已得之民，怀柔外藩诸部，以福德之盛去开创天下的大志宏图。经过增拓后的沈阳城“东西宽三百九十三丈八尺，南北长四百二十五丈六尺，合计一七六百七十六万零一百二十八平方尺，为两千七百九十三点四亩”。^④有城必有池（即护城河），城与池都是军事防御设施。明朝沈阳中卫城

^②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 奉天通志. 建置志·建置一·城堡·沈阳县. 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1963.

^③ 同上。

^④ 袁亚非. 一代盛京.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5.

^① 周远廉. 清太祖传.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7. 原载于《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六四。

的城池分两重，清代时将两池合一，成为一条更加宽阔的护城河，即外池，“阔十四丈五尺，周三十二里四十八步”。^①在城墙与护城河中间，建有围城壕，使首都城防更加完备。

皇太极拓建的皇宫，即今沈阳故宫的中路部分，位于大政殿与十王亭的西侧，井字街的中心地带，分宫内和宫外建筑两部分。宫内建筑包括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中宫清宁宫、东宫关雎宫、西宫麟趾宫、次东宫衍庆宫、次西宫永福宫。宫外建筑位于大清门以南，包括东西五间朝房、内务府、东西下马碑、轿马场、文德与武功两个牌坊等。皇太极逐渐将宫阙与城市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宫殿以城市为依托，城市以宫阙为核心的新的建筑群体——皇城。

由于城门的改建，在皇宫的前后左右形成了两横两纵的井字形街道。按照中国古代城池风水理论的原则，每座城相对的两门之间，应该有建筑物遮挡，于是又在福胜门内大街和内治门内大街相交的路口中心建钟楼，在地载门内大街与外攘门内大街相交路口中央建鼓楼。钟、鼓二楼之间的东西向大街（长174丈、宽3.5丈）则规划为商业街，取四季平安之意，命名为“四平街”，俗称中街。

皇太极时期，在井字街内，又陆续建成了11座亲王（郡王）府第^②，这11座王府均按当时盛京八旗方位分布，两红旗在东，两白旗在西，两黄旗在北，由于王府中无正蓝旗，故城南无王府。诸王府均分布在皇宫周围，井字大街分割的9个区域之中，无形中対皇宫形成了一种护卫。

皇太极在盛京城内还兴建了办事官署，在皇

宫崇政殿前东侧，建有内三院衙门，在武功坊之南偏东，建有都察院，在文德坊之南建有理藩院。皇太极将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衙署分别设在城南的两座南门以内。

为祈天地神灵庇佑，除保留本民族传统建堂子之外，1636年（天聪十年），又在盛京城德盛门外南5里建天坛，在内治门东3里建地坛，城西南建社稷坛、风雨坛，在城外东南建日坛、太庙，加上皇宫后四平商业街，形成“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格局。

17世纪初，喇嘛教已传至关外，喇嘛教在清朝上层社会被广泛推行，在城市建设中也有所反映。皇太极在外攘门外修建实胜寺，占地约7000平方米，整个寺庙呈方形，坐北朝南，建筑气势雄伟，这是沈阳最早的喇嘛寺院。为镇护盛京都城，1640年（崇德五年），皇太极下令在沈阳四郊建四座喇嘛寺塔，四塔均为藏式喇嘛塔，以盛京皇宫为中心呈对称布局。崇德八年（1643年）开始修建佛寺，1645年（至顺治二年）告竣。据“四寺四塔文碑”碑文所记：“东（抚近门外5里处）为慧灯朗照，名曰永光寺；南（德盛门外5里处）为普安众庶，名曰广慈寺；西（外攘门外5里处）为虔祝圣寿，名曰延寿寺；北（地载门外5里处）为流通正法，名曰法轮寺。”^③四塔四寺分别建在距盛京城约5里的东、西、南、北四面，四方等距，塔寺结合，分据一方，这种塔寺合卫新城的格局是我国乃至世界城建史上所仅见的，反映了清代统治者利用宗教联系各族人民，以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政策，四塔四寺与城内宫阙相辉映，确有“皇图一统大，佛塔四门全”的气魄。

城内排水系统也逐步得到了完善。沈阳城地势较高，利于排水，皇太极下令，在城内四面靠近城墙里侧的地面，利用筑墙取土留下的深坑，

①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 奉天通志·建置志·建置一·城堡·沈阳县. 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1963.

② 据《盛京宫阙图》载，这11座王府分别为：礼亲王代善府、武英郡王阿济格府、睿亲王多尔袞府、豫亲王多铎府、郑亲王济尔哈朗府、颖亲王萨哈廉府、饶余郡王阿巴泰府、肃亲王豪格府、成亲王岳托府、敬谨郡王尼堪府、庄亲王府。

③ 丁海斌，时义. 清代陪都盛京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55.